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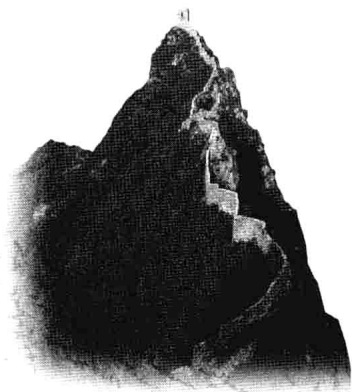
传统文化 与思想道德建设



安徽文艺出版社

CHUAN TONG WEN HUA YU SI XIANG DAO DE JIAN SHE

传统文化与思想道德建设



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编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统文化与思想道德建设/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编.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1. 5

ISBN 7—80640—329—9

I. 传… II. 福… III. 传统文化—关系—思想政治教育—研
究—中国 IV. D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22536 号

传统文化与思想道德建设

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 编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省福州市计委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斗西路 21 号 邮编: 350005)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4.5 印张 2 插页 350 千字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80640—329—9

I · 264 定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序 言

张 渝 民

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的“传统文化与思想道德建设”学术研讨会，是在全党全国大力贯彻“十五大”精神，深入开展邓小平理论学习的形势下召开的，是在我们国家具有特殊意义的1999年召开的，它成为我会迎接建国50周年大庆的一项主要活动。会议的主题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弘扬中华优秀的道德传统，发扬革命先辈及福建历史上志士仁人的爱国精神、民族气节、高尚情操和优良品德，把优秀的道德传统与时代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培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德、为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作出贡献。

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历来予以高度的重视。在老一辈的革命领袖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对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问题作过深刻的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和树立优良的道德风尚，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思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些论述，为我们新时期的思想道德建设指明了目标和方向。

近年来，遵照邓小平同志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党中央采取了许多措施以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十四届六中全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具体指明了思想道德建设的要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一伟大任务，同时进一步指出：“深入持久地开展以为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道德教育，加强民主法制教育和纪律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一切都说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我们就这个问题开展研讨，其现实性是很强的，是很有意义的。

研究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必然联系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因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既渊源于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不少积极思想因素，如“自强不息”的坚毅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是数千年来优秀人物所坚持的立身情操，并为历史上许多道德高尚的杰出人物所效法。屈原的志洁行廉、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等，都是其著名的例子。他们的道德修养对我们民族的成长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的言行成为激励后人的精神力量。进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一方面，必须认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从中吸收优秀的、健康的、有益的养分；一方面，必须进行新的实践、新的探索，总结思想道德建设的新经验，使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去年，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大建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就提出：“求知与修养相结合，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优秀文化传统。”他希望青年们注重思想修养，陶冶情操，努力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为有了好的思想品德，才有可能把学到的知识真正奉献给祖国和人民。这里，不但指出了思想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也提出了继承和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毫无疑问，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包括思想道德，必须批判地继承，吸取其人民性、科学性的精华，抛弃其封建的落后的东西。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坚持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进行具体分析，在批判中继承。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所不可缺少的。

当前，我们正满怀信心，为实现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在社会上，到处是生机蓬勃、振奋人心的新风尚、新气象，但也存在着种种令人担忧的消极现象，诸如以权谋私、徇私枉法、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等等。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健全法制、严明纪律，同时还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为了确保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方针的全面贯彻，确保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确保跨世纪发展的目标的实现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央决定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深入进行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三讲”教育，从根本上说来，就是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干部，提高政治素质，加强党性修养，端正思想作风，这同开展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紧密相关的。只有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律、自励，才能自觉地抵制歪风邪气，经受住权力和金钱的考验，使干部队伍的面貌焕然一新。我们这次研讨会，围绕着传统文化与思想道德建设这一主题，进行了多方面的丰富多彩的论述。对“三讲”教育的开展，具有现实意义和促进作用。

目 录

序言.....	张渝民 (1)
传统道德的现实价值.....	张善城 (1)
论传统道德的落实过程及其启示.....	谢宏忠 (13)
论对中国传统道德的继承和创新.....	张华荣 (22)
论传统文化中“义利之辨”的得与失.....	李淑贞 (35)
儒家德治思想之再认识.....	邹永贤 (43)
儒学恕道的现代价值探微.....	陈桂蓉 (54)
《周易》中的民族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张立云 (62)
《论语》对“三德”建设的意义	郭启宗 (70)
道家“理身理国”的政治伦理.....	詹石窗 (81)
孔子德育思想再认识	柯远扬 (102)
孔子道德教育思想及其现代转化	陈沙麦 (112)
朱熹义利观及其当代价值	张品端 (117)
朱熹道德观述评	殷江波 何乃川 (123)
朱熹的道德修养论的启示	程利田 (129)
陈襄思想及其影响	黄保万 (135)

仁义道德与现代社会	高令印 (145)
宗教道德与现代道德建设	林兆荣 (154)
古往今来的正气观	罗耀九 林平汉 (162)
气节刍议	林铁民 (173)
社会转型与思想道德建设	黄顺力 蔡永明 (183)
社会主义道德的价值取向	
——兼论对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扬弃	陈锦谷 (190)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	余绪纛 (199)
试论科学道德的弘扬	周 济 (210)
科技创新对传统文化及道德建设的双刃影响	庄艺真 (220)
中华民族精神之升华 精神文明建设之硕果	
——论抗洪精神的实质	廖志诚 (233)
抗洪精神是传统道德的弘扬与升华	叶志坚 (244)
中国传统文化与周恩来青少年的成长	贺东航 (255)
周恩来人格精神与传统文化	林浣芬 廖艺萍 (262)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中国传统思想道德的继承和发展	
.....	陈世奎 (274)
邓小平的高尚品格对中华传统美德的发扬	郑传芳 (282)
近现代福建文化中爱国主义精神探讨	何绵山 (290)
必须高扬闽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主旋律	林贻瑞 (297)
林则徐、严复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影响	戴学稷 (306)
严复的伦理道德思想	林平汉 (311)
福建传统民俗文化的道德教育内涵与负面影响 ...	徐心希 (319)

市场经济条件下职工职业道德建设的思考	丁文清 (331)
商人品质与传统文化	李永乐 (338)
个体私营企业主思想道德现状浅析	张巍耀 (350)
发扬优秀传统文化 提高青年人格素质	王章煌 (358)
简论传统师德观及其现实意义	田建荣 (372)
发扬“为人师表”传统 加强教师道德建设	黄 越 (382)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杨立英 (389)
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与高校德育	徐雅芬 (398)
中华传统美德在东南亚华人中的传承和弘扬	吴文华 (407)
儒家德育传统及其对东南亚华人的影响	
——兼析“亚洲价值观”失败论	张亚群 (421)
中西道德观念比较	徐晓望 (433)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近期若干学术动态评述	陈伯强 (446)
后记	编 者 (454)

传统道德的现实价值

张善城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它发端于先秦，经汉唐、宋明的发展到近代，几经凝聚、演化、整合，形成了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

但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居于核心地位的中国传统道德？这在今天仍然是值得思考、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面对这一问题，如果无批判地复兴儒学，使新儒学热居高不下，表达的是复古主义之幽情，那么在伦理道德“重建”、“重构”的呼声，中，所透露出的是民族虚无主义者对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道德的苛求与否定。二者表现形式虽然各异，但在扼杀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方面，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应当反对。

中国传统文化，是历代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是古代精神文明的结晶；而传统道德，则只是古代社会生活以及生活其中的人们道德关系的反映与概括，对于今天的社会现实，自然有其不相适应的一面。因此，对待包括伦理道德在内的传统文化，不能生搬硬套、兼收并蓄。那种把在传统伦理思想中占据主干地位的儒家伦理，当做诊治当代社会包括信仰、道德、政治、经济等在内的一切问题和实现现代化的手段，则是不科学、不现实的。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对

传统道德置若罔闻、漫不经心、摒弃了事。传统道德是经过历史的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不因人们的好恶而代代相传，它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心理与行为习惯。

如同任何新型文化不可能凭空产生一样，现代道德的建立，也不是推倒传统道德，另立炉灶。但把道德建设设想成如同穿衣着装，可以脱下单衫穿夹袄，收起夹袄换皮袍，紧跟时令转，那也是不对的。如果道德建设可以如此这般的操作，那么所建立起来的肯定不是道德，而是类乎政策条令什么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早在 60 年代，中国学术界就道德批判继承问题展开两场颇有声势的争论。那时，学术环境并不宽松，政治气候又很险恶，而许多学者却敢抒直言，从理论上阐述了无产阶级应当批判继承历史上包括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道德在内的道德遗产。这些学者，有的已经作古，有的则垂垂老矣，他们为了捍卫学术的尊严，付出了沉重的良心代价。从今天看来，他们的观点并没有陈旧，更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迂腐起来^①。两场争论留下的启迪意义，就在于从理论上阐明了一个道理：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过程中，必须批判、继承历史上流传下来、体现民族精神的传统道德。之所以如此，不是人的主观好恶，而是道德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以及建设富有民族特色的客观需要。事实证明，现代道德与传统道德之间，并不隔着一道万里长城，不可逾越，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同理，当代道德也是以继承民族传统道德作为自己产生、形

^① 学术讨论，贵在各抒己见。对抒发不同学术观点的前辈，绝无成见；对他们遭受不应有的“政治围剿”，深表同情。

成、发展的历史前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形成和发展，就是批判继承历史上一切优秀道德遗产的结果。

当然，包括伦理道德在内的任何一种科学文化形态，都具有开放性，即使被“独尊”的儒术，也不故步自封。历史上，既有援道入儒，形成“名教与自然”之辩的玄学伦理思想，又有吸收佛、道营养，构建“理学”体系，使儒家伦理思想产生了新思辨。今天，随着开放政策的实施，不仅民族与民族交往频繁，文化的交流也与日俱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务必放眼世界，吸收、借鉴西方积极的伦理思想，特别是西方近现代的伦理学说，从而弘扬优秀的道德传统，建设具有时代特点的新道德。

综上所述，对待中国传统道德惟一正确的态度是批判地继承。这里的“批判”，决不是一概拒绝、全盘否定，而是“扬弃”，如同把传统道德当成食物，通过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分解出其中的精华与糟粕、营养与废料来。“继承”，也不是兼收并蓄、生搬硬套，见马褂辫子而生羡，遇三寸金莲必作颂，把渣滓看成宝贝，一一供养起来；继承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事实胜于雄辩。具有几千年演化史的中国传统道德，确实存在着废料糟粕，诸如维护宗法等级专制制度，重整体而压抑个性发展，重道德“纲纪天下”的政治功能，冷落道德的理性思辨、逻辑论证以及道德自身规律的探索等等弊端。这就注定了对待传统道德不能无选择地一概肯定、全面弘扬。

在看到传统道德中存在的诸如此类弊端的同时，更应该找到它的精华所在。

如，倡导执政者应言行一致，加强道德修养。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反复强调统治者的榜样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

语·子路》)上行下效,己不正,焉能正人?要“身正”,就得修己、省身,加强道德修养。《大学》主张“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朱熹针对统治集团人欲横流,要“天子”克己修身,带头灭欲:“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则敬以充之。……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宋史·朱熹传》)这类“官德”,对“走上社会”的成人,特别是当权的执政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又如,追求精神境界、理想人格,坚持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人生态度。传统道德从“人贵在有义”的价值观出发,主张人不该以“饱食暖衣逸居”为满足,而应当有高尚的精神生活,把追求理想人格看成人生第一要义。孔子之前就有人把“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人生的追求目标。清代思想家魏源补上“立节”,倡导“四不朽”。孟子提出,为了养成浩然之气,“大丈夫”要立志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志士仁人应不惜以身殉道,舍生取义。崇高的精神境界与自强不息、刚强有为的人生哲学紧密相联。“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象辞》)先哲这一思想,充分体现了对生命意义的重视和理解以及积极的人生态度。这些道德观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激励变革创新、拼搏向前的精神力量。

再如,提倡先义后利、见利思义的价值导向。所谓义,指的是道义、正义,指的是社会、国家的整体利益;所谓利,指的是个人名誉、地位、金钱等私利。如何认识、处理义与利之间关系,是道德的一个永恒话题。中华传统道德十分重义。在公私、人我关系上,要求先人后己、舍己从人、克己奉公;在义利的关系上,主张“义以为上”,强调“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传统的义利观尽管有整体至上主义的倾向,但

并不一般地反对私利，它的基调与主流是“先义后利”、“见利思义”。孔子就提倡“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宪问》），所反对的只是损人利己、见利忘义。

再如，注重职业道德。鉴于医生职业，乃人的生死所系，强调“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生灵之苦”。医生对病人“不得问其贵贱贫富”、老幼美丑，也不问是否亲友，只要是病人，都要“普同一等，皆如至亲”，切实做到“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丝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唐·孙思邈：《千金方·论大医精诚》），要求从医者医术高、医德好。

而经商活动，乃“通四方之珍异”，关乎国计民生，可波谲云诡的商海，在客观上为从商者提供作奸行骗的良机，使他们见利忘义，“放于利而行”（《论语·里仁》），所以历史上很注重商业道德的建设，提倡公平交易、童叟无欺、货真价实、铁价不二。正由于经商有德，中国古代确实涌现一批诚信卓著的良贾，爱国济民、捐金纾难的义商。

总之，传统道德作为一份珍贵的遗产，并不是十全十美而是瑕瑜并存的。多年来，我们以是否有利于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为标准，通过分析考察，从传统道德中找到了许多值得继承、弘扬的美德。而这些传统美德不少已融进伦理学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之中，成为道德科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继承、弘扬传统美德，进而通过综合创新，把它转换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因，绝不是一次便能完成的。每一次只能根据时代所赋予的任务与职责，只能根据社会现实所存的在风气问题以及道德自身的发展要求，进行思考与变革。

今天，在着手继往开来的时候，就几个相关的问题，作一番

道德思考，是很有意义的。

1. 市场经济与道德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古代社会的弦高、陶朱经商与现今社会的文人下海、农民办厂、外商投资，尽管在形式、内容、规模上各有千秋，但他们的心态却是相同的，都想凭借自己的财力、能力与市场所提供的机会而谋利。那种既涉足市场又无意于利的现象，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恐怕也不会有。出于谋利的动机，从商者奉行的只能是“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的市场哲学。这类投身市场并按市场规律谋利的活动，如同农民为了粮食而春种、夏耘、秋收、冬藏一样，展示给人们的只是一种事实，即从谋利动机出发，按规律活动，最后得到盈或亏、丰或歉的结果。对这类司空见惯的现象，无论从谋利、多打粮食的动机看，还是从盈亏、丰歉的结果看，都只是一种经济活动，本身并不表现善恶，因而无法从道德上作出善或恶的判断。对此，道德尽可袖手旁观，不必干预。我们既然承认人们奋斗的一切都与利益有关，那么道德就不应该使“奋斗”与“利益”分离，而是应该让二者自由结合。如果让它们分离，道德则做了一件有背常识的蠢事；如果促使它们结合，则多此一举。因为利益以及盈亏、丰歉自身都不是道德行为，无法进行善恶的判断。把一切现象都与道德挂钩，赋予道德以重负，只会导致道德及其评价的庸俗化。

那么，市场经济在什么意义上需要道德呢？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建立，发展还很不完备，处于初级阶段。由于市场自身缺陷，给人们的精神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如何克服缺陷、消除消极影响，已成为当前经济发展乃至道德建设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性问题。

虽然健全、完善市场经济需要靠法律的支撑，但更需要伦理为它提供价值导向与人文动力。市场连四方，是个庞大的网；个

人或群体一旦进入市场并按市场规律运行的时候,就同时与上下、左右、内外连成一体,结成一定关系。如何认识这一关系,并从中确定自己应负的职责,并不是身处市场、开展经济运行的主体所能自发认识到的。它必须借助道德的认识功能。在诸多的关系中,最突出、密切的要算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或群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社会为其提供广阔的市场(消费能力的保证),市场主体则为社会提供服务。因此,对于市场主体而言,为社会生产使用价值,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人民大众服务,就成了市场主体获得利润最大化的前提条件。在这里,借鉴、发扬民族道德中的“诚”、“信”等传统,无疑是有助于强化服务社会的责任感。一个群体,如能以诚、信自律并对内部员工自觉履行关心、爱护等道德义务,那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就会因为内部凝聚力、向心力的加强而立于不败之地。这一道理,已为许多事例所证实。

涉足市场,旨在谋利、求富。但利有种种,并不是所有的利都应当追求的;求富的渠道也不止一条,并不是任何一条渠道都是可行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不是进入市场的群体或个体所能自发意识到的,而必须借助道德的教育功能。在这方面,传统道德主张“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反对“放于利而行”,强调“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就很有现实指导意义。诚然,“道”、“义”的具体内容,往往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尽相同,但谋利、求富却不能不讲道义;奸商见利忘义,以坑蒙拐骗之类歪门邪道所发的财,就属于不义之财。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市场经济需要道德的约束。

2. 个人利益的满足及其满足程度,究竟是靠道德还是靠政治、政策保证?

传统道德的义利观,常常被指责为抑制、否认个人利益,是

个人利益不能实现、满足的桎梏。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体主义原则，也不免遭受此类株连。道德果真有这般能耐，竟然可以决定个人利益能否实现以及满足的程度吗？没有！个人利益能否实现及其满足程度，是受社会物质文明发展水平所制约的，是受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所决定的。它与道德无关。个人利益作为个人存在和发展的需要，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言：“并不是一条道德诫命，而只是一件科学事实。”（《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传统道德义利观中，如果确实冷落了这件“科学事实”，那也不过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时代，物质文明水平就不高，加上残酷的掠夺与剥削，“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货志》）的平民百姓，生存尚且困难，又哪能指望靠道德的力量来满足个人的利益呢！

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理应更好地满足个人存在和发展的需要，但长期“左”的路线困扰，经济建设徘徊不前，加上把个人利益视同个人主义横加挞伐，直接导致了政策上对个人利益的否定。如果说，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体主义原则，曾经冷落过个人利益这一“科学事实”，那也无非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同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科学事实”受到党与政府的关心与重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水平正不断提高。这一历史性的变化是政治路线上拨乱反正，是富民利民政策的结果，而不能把它简单归结为集体主义道德原则之功。

道德无力决定个人利益的实现与否及其满足程度，把社会冷落个人利益的现实，归罪于道德并加以责难，是没有理由的。有史以来赋予道德“纲纪天下”的政治功能，使道德与政治一体化，是传统道德的一大显著特点。这一特点的直接结果，既给人们一种似乎道德可以决定分配、可以包揽一切的道德决定论的印象，又使道德自身的功能逐渐萎缩，为政治论证的功能无限突出，道德